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石峻文集

石峻 著

根深葉茂 實亦聲流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石峻文集

石峻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峻文集/石峻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9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1527-9

I. 石… II. 石… III. 石峻(1916 ~ 1999)—哲学思想—文集
IV. B2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0250 号

责任编辑: 白绍华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44.25 字数: 630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527-9 定价: 13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晓红

副主任委员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宁津生	石 兢	刘经南
何克清	吴庆鸣	李文鑫	李平湘
李晓红	李德仁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易 帆	谈广鸣	舒红兵	蒋昌忠
樊明文			

秘书长 李平湘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韩 进

副主任委员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费成	方 卿	邓大松	冯天瑜
石义彬	余双好	汪信砚	沈壮海
肖永平	陈 伟	陈庆辉	周茂荣
於可训	罗国祥	胡德坤	骆郁廷
涂显峰	郭齐勇	黄 进	谢红星
韩 进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石 峻

(1916~1999) 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学家、教育家。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曾用名石易元、石凤岗等。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等。他执教年间，先后开过“哲学概论”、“伦理学”、“老庄哲学”、“孔孟哲学”、“逻辑学”、“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印度哲学”、“中国佛学”、“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等十余门课程。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出过不少专著，还研究过佛学，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 1963 年 11 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出版说明

本书系我社《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之一，收录了石峻先生一生中的重要学术文章及会议记录。本书成书过程中作了少量的订正与修改，以符合出版规范，整体基本保持原貌。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

前 言

石峻先生(1916—1999),学界尊称“石公”,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佛教学者、教育家。出身于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中学时代在长沙度过,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留校,先任汤用彤先生助手,后任西南联大讲师;1948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56年,为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而调入该校,任副教授,兼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3年升任教授,兼校务委员;“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随校集体下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任该校哲学系教授;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石峻先生一生好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印,兼通多种语言,在学术界有“活字典”的美称。他在中国哲学史、佛教思想史、伦理学、古籍文献等诸多学术领域均有深厚的造诣,先后担任过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学术职务,他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石峻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代名师。在此专业范围内,尤精于汉唐哲学、佛教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料学等领域,对相关资料精熟博通,善于把握国内外的代表性研究,长期致力于方法论的思考和探索,视野开阔,观察入微,见解深刻,通过教学、著述、讲话、资料整理等各种方式,推动了这些研究领域的深化、拓展、科学

化与系统化。他作为新中国以后最早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对此学科的建设具有开拓之功。

石峻先生是著名哲学史家及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的弟子，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及佛教思想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在他们开辟的事业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今已发展为国内该领域的重要据点之一，这样的成果，若无当初石先生那一代人艰难创业、带头领队、培养人才，是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来之輩，更应饮水思源，再接再厉。

石峻先生一生忠于教育事业，勤勤恳恳，恪尽职守，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先后讲授过哲学概论、伦理学、老庄哲学、孔孟哲学、逻辑学、印度哲学、中国佛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等十多门课程，像他那样既肯于辛勤耕耘、又能胜任如此多门专业课程的教师并不多见。在他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长期坚持在课堂一线，从来不摆名教授的架子，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工作一丝不苟。在教学方法上，力求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深入浅出^①，主次分明，缓急适度，给学生提供消化和思考的余地。当今活跃在中国哲学史、佛教思想史、中国伦理学史等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当初都曾受过他的教诲。在学生的心目中，石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为人温厚的良师益友。

石峻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并不限于他的学术方面，而是还有他为人处世的风范、纯洁正直的品格。对于国家和人民，他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心。仅举一例来说，1963年，石先生由副教授升为教授。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不久，国家困难，石先生与同期晋升教授的60人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暂不领取正教授的工资，只要原有的工资即可。这个要求得到认可，于是他们当时名为教授，而实际拿的却是副教授的工资。以后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他的教授工资一直没有得到兑现，直到1990年前后工资体制改革，

① 关于深入浅出，石峻先生最为推崇胡适，认为胡适善于把枯涩的学术问题讲得明白易懂。

除了物价补贴以外，在二十多年期间，他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而在工资体制变更时，石先生由于“参加革命”较晚，结果他的工资比某些工作资历更短的人还低。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石先生不仅从来不争，而且从无怨言，工作上照样任劳任怨，心甘情愿地为国奉献。

石先生为人正直，无论对待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好，还是对待具体个人也好，他从不见风使舵，不要两面派的手腕，也不背后说人长短。例如他对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追求，认定它是真理，以后这个立场始终不改，直到90年代，依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样的主张，既不是顽固不化、迂腐保守，也不是要装给人看或邀功请赏，而是发自内心的，出于他自己的选择，跟那些随风倒、变色龙式的投机分子以及装腔作势的伪道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当年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人练就了一副“政治油条”的本领，每逢开会，事先准备好两种相反的发言材料，然后在会上随机应变，左右皆可逢源，石先生对这样的做法深恶痛绝。跟随石先生多年，从来没听过他议论谁家的是非、传别人的闲话，口中从来不出粗言恶语，也不开低级趣味的玩笑，这种涵养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

石先生从不争名夺利，什么评奖获利之事，他不凑热闹；开大会上不上主席台，全听人家安排，对出头露脸的表面虚荣不感兴趣。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网罗势力、私下串通之类，先生不屑为之，对待同事一视同仁，不搞拉一个打一个那一套。学生虽多，而不视为私有，也不要求学生服从老师，不轻易为私事使唤学生，偶尔不得已请学生帮忙，必郑重拜托、感谢酬劳，绝无颐指气使。从不抱非分之想，也不投机取巧、钻营谋利，不喜托人情、找关系，凡事凭自力，只要吃自己的良心饭就好。

石先生待人温厚，平易近人，以文会友，以道相交，善于留意他人的长处。对待比他年长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对辈分低于自己的学者，也总是恭敬有加，以“先生”称之，所以他有許多相亲相敬的忘

年交，例如楼宇烈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对于年轻学者或学生的问学请教，从来不推托，不摆谱，不卖关子，不打折扣，而总是热忱相待，鼓励提携，倾其所有，助其成长。在学术批评上，他经常告诫我们：既要服从真理，又应对事不对人，可以讨论人家的观点，而不要攻击其人。

石先生做事认真，追求完美，见识广，眼界高，大到写文章，小到留便条，每字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因此他读书多而著作少，被学界称为“述而不作”。其实这也是因为他对学术极为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既然一时还写不出十分满意的作品，那就等待时机成熟。我们读研究生时，他常告诫我们：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不成熟、有错误的东西，一旦发表出去，白纸黑字就很难改了，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先生还说过：你们学中哲史专业，就相当于过去的所谓“科班”，科班的就要专，就要精，不能停留在浮泛的水平。石先生追求的是学问而非表现，他以学术安身立命，以文章为神圣事业，以学问上的草率从事、投机取巧为耻辱，其敬业精神于此可见。

上面提到的大多是石先生不做何等事，那么他平时做什么呢？石先生是一位教师、学者、典型的“书生”，平日所做，主要就是教书、读书、买书、散步、思考，有时再加写作。他在人间最好的朋友是齐良骥先生，物中最好的朋友就是书，一生都跟书本打交道，爱书如命。从50年代起，每月用60元买书，长年不辍，是中国人民大学四家藏书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藏书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有线装古籍，也有外文原著，还有自己手抄的写本，其中不乏专业性的原版世界名著，如达斯古普塔(Dasgupta)的《印度哲学史》、拉达克里希南的(Radhakrishnan)《印度哲学》、彻尔巴斯基的(Stcherbatsky)《佛教逻辑》等。他自己的藏书大多看过，看过的地方都作有标记。看过的书很多，所以他在学术上见识广、要求高；跟书打交道，不用耍手段、斗心计，所以他在为人上很清白、很单纯。先生内心孤高，兼能明察人情世故，所以慧眼看书力透纸背，静观世事入木三分，每每于玄远抽象的议论看穿其背后隐藏的世俗内涵。

这些只是我们看到的一点点。关于他的为学与为人，学界有口皆碑。正因为石先生道德、文章俱佳，所以才赢得学界的广泛尊敬和衷心爱戴。对于我们后学来说，石先生的为学与为人，堪称高山仰止，永远值得尊敬效法。在学术研究条件远远胜过石先生当年的今天，出书发文、堆积成果或许已非难事，但是在学问事业乃至为人处世方面，要想学到石先生那样的精神，达到他那样的境界，却还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在人文价值失落、金钱利益至上、虚浮夸张泛滥、欺世盗名猖獗的当今学术界，石先生那样的精神品格更是弥足珍贵，尤其值得提倡。

石峻先生曾在武汉大学执教数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因此而与武汉大学结下深厚的情谊。在我们求学期间，常能听到他提起唐长儒、肖蕙父、唐明邦等先生的名字。记得1994年11月，我陪先生去湖北黄梅参加禅宗学术会议，路过武汉，石先生带我在武汉大学校园参观，指点当年旧地，如数家珍，兴致盎然。最后在武汉大学正门前留影，加重语气高声说道：“这是国立武汉大学！”听得出，先生的话语中饱含着对这所大学的深情与自豪感。

意想不到的，在石先生调离武汉大学60年之后，这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还挂记着她历史上的各位先生。为纪念武汉大学建校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汇集该校百年以来名师的作品，出版一套《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石先生也被列入其中。先生在天有灵，定会为此而自豪，而高兴。作为学生，我们也为石先生感到荣幸和欣慰，并向武汉大学表示衷心的敬意。

受武汉大学教授麻天祥先生的委托，由我来整理编辑石先生的文集。我于198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以后也常从先生受教，十几年间幸蒙师恩，然而不曾有所回报，心下愧疚，于是甘心接受麻先生的委托。这部文集能在短时间内编成，是因为借助了各位师友的劳动成果。数年前，在向世陵、宋志明、方尔加、张利民、董群、杨庆中、蔡大梁、陈小兰、罗安宪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诸位研究生的努力下，将石先生的作品收

集、录入、校对、整理，先后结集为《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和《石峻文脉》（华夏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部文集里收录的作品，都是从以上二书的电子本中选取出来的，因此要向他们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石峻先生的作品至今尚未收齐，本书实际上也还是一部选集，不过这里把石先生的作品集为一册，更便于读者了解他的学术概貌。本书没有采用上面二书中分类编排的办法，而是将石先生的作品按年代顺序编排，目的是为了展示他学术研究与思考的发展历程。由于书中有些文稿的写作年代不详，编者只能根据相关资料或线索推测其完成的年代，所以难免有推测不准、编排不当之处。为便于读者阅读，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来的电子本底稿做了一些修改或删节，如修正文字、标点，理顺文句或段落，核对引文，标明出典，改写文章题目，删去不必要的字句，改正文中错误，等等。修改的地方较多，为避繁琐，故未一一注明。改动的原则是“辞不害意”，即尽量不损害原作品的意义。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再加时间仓促，肯定会有编排整理上的疏漏错误，凡此之类，罪在编者，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除了收录有石先生生前发表过的作品之外，还有他生前未刊的遗稿、讲义、会议发言稿或发言记录等。先生的《伦理学讲义》，此次由董群教授重新作了修改编订。2006年《石峻文存》出版之际，石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任继愈先生以90高龄特为作序，如今任先生也已不在，编者斗胆做主，将此序文作为本书的“代序”。附录中有向世陵教授和杨名博士整理的《任继愈先生访谈录》，若与“代序”并读，可以了解任公眼中的石公为学与为人，以及二公之间的深情厚谊。附录里还有牟钟鉴先生辑录的《石峻教授学术讲话要点记录》、董群教授整理的《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谈话》，这两篇也是反映石先生学术观点的重要资料。另外，关于石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杨庆中教授的《石峻先生学术》介绍最详，此次他又作了补充，读者可以从了解石先生学术的要点，故亦编入附录。顺带说明，迄今已有很多学者写过回忆、叙述、评价石先生的文章，然因篇幅所限而割爱，敬请

谅解。

最后，本书的编成与出版，全赖诸位师友、武汉大学麻天祥教授、禹燕民老师及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热情帮助，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邢东风

2013 年 5 月 31 日 于日本爱媛大学

代 序^①

任继愈

回忆 1934 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共有十六人，中间还有转系的，又经过抗日战争及其他变故，1938 年在哲学系毕业的只有三人。三人中有一人赴美国留学期间死于肺癌，几十年间哲学系毕业生始终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只有我和石峻两人。我和石峻是多年老友，互相称名道姓，有时我称他为石公。

当年北平共有五所大学，国立大学有哲学系的只有北大、清华、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很少学术交流。清华大学的哲学系注重逻辑学和美学，北大则注重中、西哲学史及佛教哲学。石峻学长（以下均称石公）和我都受北大学风熏陶，也都偏重中、外哲学史和佛学。

大学二年级时，我们俩曾打算翻译一本讲康德的英文小册子，他译前半，我译后半。后来日本侵华形势越来越紧张，同学们都关心时局，无心译书，这件事就不再提起了。当年北大的校风比较重自学，必修的课程不多，学满一百三十二个学分即可毕业，自学时间很多，图书馆出入自由，看书随便，石公看了不少俄国作家的小说（多为英译本）。除了哲学外，我们还旁听了一年的初等微积分。

真正朝夕相处，还是在大学三年级读完。抗战开始以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天津南开大学成立临时大学。师生可以到湖南长沙报到，我从山东到湖南长沙报到。由于长沙校舍不够，文学

① 本文原是任继愈先生生前为《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 年）写的序言，今作本书代序。——编者注

院、法学院的师生又从长沙迁到衡山脚下，租用圣经学院的校舍上课。半年后，又迁到昆明，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后话）。

石公和我同住在一个宿舍，同室共六人。交往就多了，虽然只有半年，我们二人的交谈时间比在北平三年还要多，相互了解也更多了。我们都感到学哲学是个严肃的事业，要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不能潦草马虎，首先要把原著读懂，做学问没有捷径。石公已定下了他将从事佛教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

我们有一次同游南嶽，一同参加的还有几位外系的同学。参观佛教古迹“磨镜台”时，石峻讲了禅宗七祖怀让启发马祖道一的故事。大家听了石公的讲解，都敬佩他的博学多识。

新中国成立前，他应武汉大学哲学系之聘，一度离开北京大学。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哲学系。这时，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副教授共达二十八人之多，主要任务是集中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和石公又聚在一起了。

全系教师以学习为主，只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一门课，每周二学时，由石峻、任继愈、朱伯崑三人备课，轮流写讲稿，石公一人主讲，讲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由个人署名的第二部书，第一部由个人署名的著作是刘大年的《美帝侵华史》。

以这部书为契机，石峻同志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学会的创始人，并被选为会长。

北大哲学系后来又开了一门“中国哲学史”课，是全系共同必修，两学年讲完，因粥少僧多，一门课分为四段，由四位教授分担。先秦段由冯友兰先生讲授，魏晋隋唐段由任继愈讲授，宋元明清段由张岱年讲授，近代段由石公讲授。这种开课方式只实行了一遍。1955年，国内各校又恢复或创建了哲学系，石公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担负了中国哲学史挑大梁的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

新中国建立了学位制度，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中国哲学史建立博士点，石公任博士生导师，为人民大学的学术建设做出了

贡献。

石公博览群书，有口才，教学方法独具心得。他告诉青年教师，初次教书，要注意“少讲多说”。“少讲”，是讲课内容不宜过多，而讲述、分析时，要反复多讲几遍，语言也不怕重复，这样讲课，同学记得牢，效果好。这些宝贵的经验，是他几十年来教书的切身体验，值得重新提出来，供参考。

石公治学广博，眼界也高，对学术要求极严，他对学问谈论得多，写成文字的少。这个文集对他的造诣和学识来说，不过百分之一。他留下来文章不算多，这对他个人，对学术界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老朋友中像他这样性格的还有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张正烺教授。他也没有把自己的学问写成书留下来。

石公嗜书爱书。每次买回新书，必先亲手用牛皮纸包书皮，其技术整齐方正，无人能及。我们老朋友去他的书房提出书名，请他把包着书皮的书取出，他能信手取下，百试不爽。我们都说他有“特异功能”。听说他临终前，已不能说话，手写了两个字留给家人，这两个字是“保书”。

石公生活朴素，无太多嗜好，喜喝酒，但量不大；喜散步，每天必散步一小时；喜旅游，全国名山大川，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多。他履幽谷深涧不怕险阻，有似徐霞客；他率性恬淡，有似陶渊明；他目空千古，而口不臧否人物，有似阮籍；他善处师友，而不善于理家，又有似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

环顾当前我国学术界，学风浮躁，自己没有读过的书也敢乱发议论，甚至以讹传讹，抄袭剽窃，不以为耻，反以著作等身自诩，欺世盗名，泛滥成灾。对照石公为人治学，岂能无愧疚？临文执笔，不禁泫然，戚然，怆然，惘然。

石峻字柏宓，与我同年、同学、同事数十年。欣逢他的文集出版，谨为短序，以志怀念。

2006年8月1日